

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与《社会理论的基础》

科尔曼 (James Coleman, 1927—1995 年),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是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则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 他从将行动者的行动假定为是理性行动的理论立场出发,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进行了颇具新意的描述和分析, 被誉为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理性人的假设

社会学的目标是要对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变迁过程进行解释。但在如何对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变化进行解释方面存在着至少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主张要用社会系统本身的规律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变化, 另一种看法则主张要用社会成员个人的行为规律

来解释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变化，因为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变化不过是组成为“社会”的无数个人行为的结果。科尔曼同意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解释社会系统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但他认为一般地说来，以个人的行动和倾向性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系统的行为可能更好。他批评那些以社会规范为起点的社会理论无视人有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的自由以及社会限制着这种自由，认为按照这种理论便无法研究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也无法对不同的系统行为进行评价。在本书中科尔曼就是采取以个人行动为基础来解释系统行为的做法。

对于个人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中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科尔曼提出他将把个人的行动假定为理性行动。所谓理性行动，指的是“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①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不少人对把人的行动假定为理性行动的做法持有异议，认为这种假定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并不都是理性的。科尔曼解释说，之所以要把人的行动设定为理性行动，除了提高理论的预测能力和保持理论简洁方面的考虑外，还因为许多被局外人认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的行动用行动者本人的眼光来衡量则完全是合理的。科尔曼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②

基本的行动和关系

科尔曼从最基本的行动和关系入手来展开他对社会系统的分

析。按照他的看法，在社会生活中，行动的基本要素是行动者和事物（资源或事件）。当行动者拥有满足自身需求所必要的那些资源（如私人物品、对某一事件如选举的控制权或影响力、对自身行动的控制权等）时，行动者就将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独立使用那些资源。相反，当行动者对能够使其得到满足的各种资源没有完全控制，并发现部分此类资源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促使他设法去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交易。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了一些最基本的行动类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有：简单的社会交换关系、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等。

简单的社会交换

当两个行动者使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换取对自己有利但却掌握在对方手里的资源时，就产生了自发的交换行为。商品交换是最典型的社会交换，但社会交换不限于商品交换。科尔曼认为经济交换和非经济交换的区别主要在于，与前者有关的各种交换制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而与后者有关的各种制度还很不完善。此外，在经济交换中，交换多半是自愿的且双方都能获利；而在非经济交换中，交换则有可能是非自愿的、强迫的，如孩子拾起扔在地上的衣服以换取家长不打他的屁股。

科尔曼把经济学中的“均衡”和“最优状态”这样的概念引入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社会均衡”和“社会最优状态”这样的概念。交换使交换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当交换达到这一点，即任何进一步的交换都不再能够增进双方的利益时，交换就达到了一个均衡点；有一系列这样的均衡点，在其中任一均衡点上进行的交换都能使双方获利；以此为前提，当不再有任何自愿

的交换出现时，便实现了社会最优状态。

权威关系

当某个行动者没有资源和事件可以和对方交换而只能将自己的行动或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出让给对方时，通过交换就产生了权威关系。权威关系的定义是：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和乙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

科尔曼认为，根据人们转让行动控制权的不同原因，可以将权威关系分为“共同的权威关系”和“分离的权威关系”两类。在前一种关系中，出让控制权的行动者认为，遵从权威比自己更好，因此在没有任何附带报酬的条件下单方面转让行动控制权（如在原始公社和现代工会中出现的情形）。在后一种关系中，出让控制权的行动者并不认为服从权威对自己有利，他们转让控制权是与一系列额外报酬进行交换（如在奴隶关系、雇佣关系、科层制等关系类型下出现的情形）。这两种权威关系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在共同的权威关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1. 由于坐享其成或“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本用以满足集体利益的规范往往难以引导人们为集体而行动；
2. 个人将自己的权利出让过多，从而可能影响到行动者的独立行动。而在分离的权威关系中可能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1. 被支配者没有行动的积极性；
2. 支配者对被支配者形成过度支配。

权威关系还有简单与复杂之分。在简单权威关系中，行动者转让的只是行动控制权；在复杂权威关系中，行动者不仅转让行动控制权，而且还转让转让控制权的权利。

信任关系

当交易无法即刻完成，存在着时间滞后时，信任就成为交换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时的交换关系就成为一种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可以定义如下：行动者甲出于对行动者乙的信任，将自己的某种资源委托给乙使用，以此来获得不存在这种委托关系时所得不到的利益，甲与乙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称为信任关系。信任关系中的甲称为委托人，乙称为受托人。

委托人对备选受托人是否给予信任，取决于三个因素：1. 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 P ；2. 受托人不可靠而委托人可能遭受的损失 L ；3. 受托人确实可靠情况下委托人可能得到的利益 G 。科尔曼用模型将有关思想表述如下：

如果： $P / (1 - P) > L / G$ ，则意味着可以给予受托人以信任；

如果： $P / (1 - P) < L / G$ ，则意味着不可以给予受托人以信任；

如果： $P / (1 - P) = L / G$ ，则意味着既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受托人以信任。

至于受托人是否讲究信用，则受本人道德观念和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两者的影响。

行动的结构或系统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由于各种机缘而形成上述不同社会关系。许多基本的两两关系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行动结构或社会系统。

社会交换系统

当交换不是发生在孤立的两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相互竞争的许多人之间时，就形成了社会交换系统。在社会交换系统内，不仅存在着各种直接交换，而且也存在着各种间接交换。这就要求在交换系统内形成一些类似于货币的交换媒介，以便对暂未完结的交换进行结算。可转让或不可转让的承诺、中介人或机构、正规组织以及社会地位等都是这样一些交换媒介。社会交换系统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存在着一定的法规。

权威系统

一系列权威关系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权威系统。简单的权威关系连接起来就形成了简单的权威系统；复杂的权威关系连接起来则形成复杂的权威系统。在多数情况下，简单权威系统不存在着内部分层，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即使如此，它的层次结构也与复杂权威系统中的等级结构有着本质差别。复杂权威系统至少拥有三个以上的内部层次：拥有权威的领导人、副手和被支配者，而且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递次转让权威的关系（被支配者将权威授予领导者、领导者将权威转让给副手、副手向被支配者行使权威）。复杂权威系统一般都是由职位构成，而非由自然人构成，目的是为了保持结构的稳定以及解决三个层次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信任系统

一系列信任关系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信任系统。有三种类型的信任系统：相互信任系统（每个行动者都对其他行动者持信任态度）、中介人信任系统（甲信任乙，乙相信受托人丙的履约能力，从而甲也信任丙的能力）和第三方信任系统（行动者甲出于相信

某个第三方的承诺而与乙进行交易)。这三种信任系统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

社会资本

人们通过交易形成了上述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可以被个人当做一种资源来为自己服务,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它们于是成为了人们可用来满足自己利益的一种特殊资本——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特征是:1. 它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只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2. 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③社会资本的具体形式包括信任关系、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社会组织等。导致社会资本出现和消亡的主要因素则包括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意识形态等。

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论述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虽然“社会资本”一词并非科尔曼首创,但这一概念在当今社会科学界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尔曼在本书中的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科尔曼揭示了由最基本的个人行动如何构成最初的各种社会关系,然后又由最初的社会关系如何建构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结构或社会系统的大致过程,揭示了社会结构和过程由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转变的途径和机制,建构了

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理论有所不同的、完全以理性的个人行动假设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体系。

现代社会和法人行动者

对法人行动者的探讨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的重要特色。所谓“法人行动者”主要指的是现代社会中具有法人地位、按明确的目标组织活动的法人团体，如企业、工会和国家等。与法人行动者相对应的是个人或自然人。法人行动者与自然人的主要区别是：自然人是独立的个人，法人则是一个集体；自然人是有形的，法人行动者则是无形的；在自然人那里，委托人与代理人是合为一体的（行动者自身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而在法人行动者那里，委托人和代理人则是分离的。此外，按照科尔曼的说法，“法人行动者”还有旧式与新式之分。旧式法人行动者指传统社会中那些自然形成的集体，包括家庭、民族、种族和社区等，新式法人行动者则是现代社会中那些为人们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组织；旧式法人行动者仍然是由自然人构成的，新式法人行动者则是由职位而非自然人所构成。

科尔曼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原始的社会联系和以此为基础的旧式法人行动者正在逐渐为新的、有目的创造的法人行动者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所取代。社会越来越趋于围绕着非个人的法人团体而重新组织，这就逐渐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以法人行动者而非自然人为基本元素（当然自然人依然存在）。这就为现代社会中的

人与现代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要求他们去研究许多传统社会的成员所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如如何建构法人团体、如何控制法人团体，如何去恰当地描述和理解法人行动者和自然人并存但以前者为主要成分的现代社会中互动过程（法人团体与自然人的互动、法人团体与法人团体之间的互动），等等。为了研究这些新问题，社会学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新发展。

在现代社会遭遇的上述各种新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这就是伴随着法人行动者的成长而出现的社会资本的逐渐减少。科尔曼满怀社会关切地说道：“要求创立新社会科学的原因之一是原始性社会组织的衰落造成的一种真空状态。原始性的社会组织依靠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这种社会关系强迫人们履行义务，确保相互之间的充分依赖，促使人们为他人或原始性法人团体的利益而努力并禁止坐享其成。然而这种社会资本已受侵蚀，留下许多真空状态。已发生此种变化的最重要领域很可能是通过养育下一代而实现的社会更新。……因此，新社会科学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削弱传统社会基础的神秘力量需要同谋，而是为了重建社会，填补因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组织遭受侵蚀而留下的真空。”^④

概而言之，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理性选择理论”引进社会学分析，通过借鉴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创建了一个与以前的诸多社会学理论体系非常不同的、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并将这一理论体系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的见解。尽管有人批评他提出的这一套理论经济学色彩太浓，忽视了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以及他提出的关于人的理性选择的假

设是不现实的，但他所提出和论述的这一社会分析思路对当代社会研究还是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就此而言，《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确实值得一读。

(厉以宗)

注释：

①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②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③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④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15—716页。